

朝 阳 地 区

揭发批判“四人帮”及其

死党、党羽、亲信罪行大会发言稿

中共朝阳地委揭批“四人帮”办公室编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 目 录

彻底清算“四人帮”及其死党、

党羽、亲信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的罪行

.....中共朝阳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齐雨航(1)

王吉道、王智升拉帮结伙极力推行

“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的罪行必须彻底批判

.....中共朝阳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狄俊选(5)

彻底批判“四人帮”及其死党的亲信

王吉道、王智升、徐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

.....中共朝阳农学院委员会副书记棋琴(11)

篡党夺权的一个铁证

——揭发批判王吉道、王智升、徐明的反党罪行

.....中共朝阳县木头城子公社委员会副书记郭吉信(18)



# 彻底清算“四人帮”及其死党、党羽、 亲信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的罪行

中共朝阳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齐雨航

早在一九七五年底和一九七六年初，“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政治需要，恶毒地抛出了“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他们打着反对走资派的旗号，肆意篡改毛主席关于党内走资派的完整论述。他们丧心病狂地诬蔑我们党内、军内有“一个资产阶级”，根本颠倒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妄图打倒我党我军一整套干部，摧毁我们的党，摧毁我们的军队，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四人帮”的死党毛远新和他的党羽、亲信，对这一反革命政治纲领卖命地推行，在辽宁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我们朝阳地区，因为有王吉道这个受死党和大总管赏识的亲信的恣意妄为，因为有王智升这个下山虎的横踢乱咬，因为有徐明这个出卖了灵魂的政治骗子的为非作歹，广大干部和群众受苦就更深，受害就更大。人们对他们的罪恶行径，早已怒不可遏，现在到了彻底清算他们罪行的时候了。

死党毛远新和他在朝阳地区的亲信王吉道、王智升、徐明等人是怎样推行这一反革命政治纲领的呢？大体有三个步骤：这就是大造帮舆论，大树黑典型，大搞层层揪。

## 大造帮舆论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死党毛远新很懂得舆论的重要，他利用自己窃取的权力，对这一反革命政治纲领声嘶力竭地加以叫卖。一九七六年春季以来，在辽宁开动了一切宣传机器，什么“三、四百元一栋楼，汽车警卫样样有”，什么“一类老爷在中央，二类老爷在省，三类老爷在市”等等谬论一时甚嚣尘上。他们的党羽、亲信们也都赤膊上阵，各有发挥，有的甚至提出：“四类老爷在县，五类老爷在社，六类老爷在大队”。他们的亲信王吉道有“创造”，他不仅狂叫抓“走资派”，还提出了抓“走资人”，还发明了个“大官小官相对论”。按照他们的反动逻辑，县委书记跟公社书记比，县委书记是大官；公社书记跟大队书记比，公社书记是大官；大队书记跟生产队长比，大队书记是大官；生产队长跟社员比，生产队长是大官。他还胡说过地委机关的秘书也是大官，如此等等，一言以蔽之，凡是干部都可称之为大官，都要从这里抓“走资派”。

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在我们辽宁的舆论阵地上，到处都充斥着他们大抓“走

资派”的叫器。报纸、广播大吹特吹，文艺作品大写特写，戏剧舞台大演特演，各种会议大灌特灌，理论讨论会上大讲特讲……三天一个死党精神，四天一个李伯秋指示，五天一个宗明兰讲话。在那个时候，死党精神依然是天朝圣旨，宗明兰讲话也变成了玉律金科。谁若稍有违抗，大帽就要铺天盖地压来。

死党毛远新捏造了一整套所谓划“走资派”的标准，用以取代毛主席的“三要三不要”的根本原则。在他们的宣传里，把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当成了划走资派的政治标准，把“三、四百元一栋楼”当成了经济标准。他们的亲信王吉道竟把什么“三转一拧，石灰锤顶，院内有井”也当成了划“走资派”的标准。在比例上，他们也作了别有用心心的估计。死党毛远新学着他老娘的腔调说，老干部百分之七十以上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统统应该打倒。王吉道、王智升、徐明这些亲信们，鸚鵡学舌地到处贩卖这些黑货。如果依了他们这种估计，听信了这种邪说，我们的党政军各级领导同志，就都成了“走资派”了，都该被打倒了。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四人帮”和他们的死党、党羽、亲信，对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干部，充满了刻骨地仇恨。他们喊出了我们党在民主革命中和社会主义革命中打倒的所有反动阶级渴望报仇、复辟的心里话。他们不仅要向社会主义反攻倒算，而且要向民主革命反攻倒算，他们是地地道道的“还乡团”。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打倒我们党从建党时期到文化大革命的一套干部，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复辟资本主义。

## 大树黑典型

在死党毛远新亲自导演的反革命大合唱的喧闹声中，他们又精心地选中了一个黑典型，此人就是今天在台上的这个“四人帮”死党在朝阳的亲信王吉道。

李伯秋要王吉道这个“典型”当个“带头羊”，承认自己是“走资派”，然后抓一大批“走资派”，抓一层人，在辽宁全面地贯彻落实“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

因为他们很明白，他们那套反动说教，反对者多，相信者少。只不过由于他们当权，人们敢怒而不敢言。在这种情况下，找个相当地位的人物出来承认自己是“走资派”，充当他们帮理论的活标本和辩护士，借以欺骗广大干部，这就显得十分必要。于是，死党和大总管向全省各地派出了亲信，四处搜罗“典型”。在这场闹剧中，省宣传组那个女亲信宗明兰抢到了头功。一九七六年六月中旬，宗明兰破天荒地驾临辽宁西部边陲。她先到昭盟，想到草原上找个大“走资派”，可是昭盟盟委的领导同志谁也不当。她十分扫兴，便从昭盟来到了朝阳。在这里宗明兰受到了盛情接待。到达凌源时，地委还在那里开“三夏”会议，亲信王吉道、王智升殷勤作陪，奉为上宾。王智升还亲临宗明兰卧室热情探望，通过这个女亲信向死党表示了耿耿忠心。就在这次会议上，王吉道按照帮观点，吐沫横飞，讲了自己怎样走了走资派的路，迈了走资派的步，成了还在走的走资派。对王吉道的黑报告，宗明兰如获至宝，当即许下诺言，说回去就向死党和“大总管”汇报。宗明兰随即以异乎寻常手段和速度向上转递。李伯秋阅后，马上批示，多打小样，分送常委。与此同时，又派特使专程送往北京，亲自交给了死党毛远



新。死党欣赏不已，并指示火速登刊物……于是，一九七六年《理论与实践》就不惜版面，以显著地位刊登了王吉道的黑文——《谈谈我对“走资派还在走”的认识》。之后，王吉道就到沈阳各处讲用。他的录音，到处播放，一时间，他简直成了辽宁政治舞台上的特等“明星”。但是，全省各级干部却遭到了一场浩劫。从领导干部到一般干部都遭到了这样的质问：“资产阶级在党内，你在内不在内？走资派还在走，你走没走？”一个个被扣上了“走资派”的帽子，甚至在各级干校学习的老同志也不能幸免。

王吉道在朝阳地区更是不遗余力地四出奔走呼号，利用他在地委内一把手的权力，到处“现身说法”到处叫嚷：“走资派”是“上边有下边有，上边指挥下边走；党内有党外有，党内领着党外走。”照这种走法，那就“走资派”遍地走了，我们的党就成了“走资派”党，我们的国家就成了走资派国家了。这完全是对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和我们广大的革命干部的恶毒诬蔑。这显然是“四人帮”及其死党毛远新的一个大阴谋。

王吉道真想当“走资派”吗？不是，他明白，这样充当典型为死党卖命是有利可图的。岂止不当“走资派”，还可以借此飞黄腾达，更上几层楼。若不是“四人帮”倒台，王吉道顺着“四人帮”的政治阶梯破格高升是指日可待的。死党和大总管让他出来当典型，这完全是一场政治骗局。因为王吉道是军代表，是一个地区的党政军一把手，又是什么带领朝阳人民“起宏图”的救世主，这样的人都承认自己是“走资派”了，那么，别人还有什么理由不承认呢？！这不是骗局、圈套、阴谋吗？但是，历史是无情的。实践证明，王吉道完全是死党毛远新的忠实鹰犬，他出卖灵魂，大肆贩卖“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全省广大干部对王吉道指背而骂、切齿痛恨这完全是罪有应得。

## 大搞层层揪

死党毛远新和他的亲信们把大抓“走资派”的舆论造得震耳欲聋，把王吉道这个黑典型吹上了天，这都不是目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打倒那些“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一套干部”。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要给各级班子动大手术，就是要“一批二斗三枪毙”。然后，由他们这个反党帮派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

其实，死党毛远新整毛主席亲手培育的这一套干部绝非从一九七六年才开始。远在一九七〇年他们就已经动手了。人们都还记得，辽宁有名的土产——“整风爬坡”吧！就是那个死党和他们大总管以及朝阳的亲信王吉道在建平县搞的所谓试点创造出的新“经验”。叫谁“爬坡”呢？叫各级干部。那是整风的方法吗？不是的，那是整人的方法。以创造经验的建平为例，当时就是用绳子绑着前县委书记马汉卿等同志，让他们跪着“爬坡”的。这叫什么整风，这是在摧残人，完全是法西斯专政。还有死党在鞍山创造的那个“吹氧”，又是一个整老干部的新花样。死党当时拚命叫嚣对老干部“吹氧”要“大风高温，层层烧透”。在我们朝阳地区，“吹氧”的结果，是把地委的几位老干部都吹倒了，甚至把许多中层干部也吹得不能工作了。他们大搞“吹氧”的结果，把许多班子“吹”垮了，把许多企业“吹”乱了，把队伍也“吹”散了。另外，还有什么

“开刀”、“火烧”之类的名堂，那统统是死党毛远新整老干部的残酷手段。对老干部他们何止要“火烧”，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到一九七六年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以后，“四人帮”认为时机已到，他们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死党毛远新和他们的党羽、亲信层层揪“走资派”的反革命活动也更加有恃无恐了。

他们利用安插在各地的亲信，如朝阳的王吉道、王智升、徐明之流，有组织、有计划地层层揪“走资派”。他们还利用办“虎班”，搞放虎归山，他们坐阵沈阳、北京遥控着揪“走资派”。王智升不就曾参加过死党的归山虎座谈会吗，在会议期间秘密告黑状。大咬老干部，从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咬到组、委、局的负责同志，这就是他们阴谋篡权的铁证。王吉道、王智升、徐明利用朝农这个篡党夺权的工具，各处收罗学员，大办斗“走资派”的专业，然后再派到各地去“反潮流”，揪“走资派”。王吉道还伙同徐明在木头城子公社搞了个全面夺权的试点。他们提出，在夺权问题上，要一狠、二准、三快、四大五不要。搞得人心惶惶，一片白色恐怖。当然，在一个公社夺权，还远远满足不了王吉道、王智升、徐明等人的胃口，于是他们又在全地区大搞局系结合、政校合一的鬼名堂。这就是要把全区各级党政机关人事大权都交给他们这个反党帮派。与此同时，北票县委那个女亲信，也亲自到一个大队去硬抓“走资派”，并强行在全县推行。在另一个县还用速成法连续办了十来期什么“走资派掘墓人学习班”，培训了一千多人，有的回到工厂、回到大队就大抓“走资派”，大搞夺权。一时间在整个朝阳地区刮起了一股层层抓“走资派”的妖风。

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四人帮”覆灭前夕，在辽宁又召开了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矛头完全指向党内的“两长”（组织组长、公安局长）会议。在这个问题上，王吉道也是颇有“创造”的，省里开“两长”会议，他就开“三长”会议，以示紧跟“四人帮”反党到底的决心。如果说在这以前“四人帮”的死党及其亲信们是在磨刀霍霍，那么，到这个时候，就是要动手杀人了。

他们所谓的层层揪，就是为了揪一层人，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要由下往上揪，一级盯一级，一直盯到中央政治局。这就是说，他们层层揪的目的，完全是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毛主席逝世前后，他们对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已经垂涎三尺，在朝阳通过王吉道、王智升、徐明这样一些亲信之口，已经把死党毛远新要当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反革命舆论造得十分肉麻，令人作呕。那个“白卷”英雄、现行反革命分子张铁生就曾直言不讳地说过：我“心愿张春桥当总理，毛远新参加中央领导”。这就是“四人帮”的党羽、亲信们的自供状。这也正是他们恶毒攻击周总理、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大搞层层揪“走资派”的罪恶目的。“四人帮”在朝农那个亲信徐明曾经大言不惭地说过，我这个大学党委书记到中央当个教育部长也算不了提拔！话虽不长，但徐明一类亲信们那种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和丑恶灵魂已经暴露无遗了。

“四人帮”在辽宁那个死党毛远新及其党羽、亲信们本来以为，经过他们的这一系列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就可以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级领导干部统统打倒，只等欢迎女皇登基了。可惜，他们刚刚粉墨登场，梦想迎来他们“盛大节日”的时候，华主席



率领全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立即敲响了他们的丧钟，宣判了他们的政治死刑。死党毛远新也就落得个与王张江姚同样的可耻下场。他们在朝阳地区的亲信王吉道、王智升、徐明也被压上了历史的审判台。而他们所要打倒的那一大批革命老干部，却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在朝气蓬勃地战斗，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正在继续谱写新篇章。

## 王吉道、王智升拉帮结伙，极力推行 “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的 罪行必须彻底批判

中共朝阳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狄俊选

“四人帮”这伙新老反革命组成的黑帮，是十分阴险、十分凶恶的反党阴谋集团。他们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为了篡党夺权，抛出一个“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四人帮”的死党毛远新安插在我们朝阳地委的亲信王吉道、王智升，极力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在我们朝阳地区拉帮结伙，拼凑帮派体系，疯狂打击老干部，他们犯下的严重罪行，我们必须彻底揭露，彻底批判，肃清其流毒。

### (一)

王吉道、王智升，为了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拉帮结伙，拼凑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残酷地迫害打击老干部。他们颠倒敌我关系，疯狂推行“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他们不仅对“四人帮”那一套心领神会，而且大加发挥创造。几年来，他们利用各种机会，采取种种卑鄙手段，对老干部大整特整。王吉道、王智升打击老干部，主要有以下几种手段。

一、对革命老干部全面否定，一概打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实践，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但是，我们对于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干扰和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必须在这次揭批“四人帮”运动中认真加以解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四人帮”与林彪反党集团相勾结，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

身份和掌握的舆论工具，鼓吹要“革我们革过命的命”，“要彻底砸乱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掀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妖风。由于受这种反动思潮影响，又由于我们朝阳地区有王智升之流推波助澜，从地委领导到基层单位各级领导干部，都被打成“刘少奇的代理人”，扣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帽子，罢了官，夺了权。特别是公检法机关，不但那里的领导被视为罪大恶极的人，就连一般公安干警，都被他们当成无产阶级专政对象，集中“办学习班”，不得独自动，不能和亲人通信，不能和家人见面，就是上厕所，也必须三人同行，互相监督，有的被打得蹲都蹲不下，坐也没法坐，耳朵几乎被打掉，眼睛几乎被打瞎。大搞逼供信，三、五天内就打出个叛徒，一个特务，一个反革命，简直象法西斯的集中营，国民党特务搞的白官馆、渣滓洞。他们把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描绘得比旧中国的官府衙门还可恶；把凡是担负一定领导职务的同志，统统与“走资派”相提并论，胡说：“老干部参加革命时间越长，罪恶越大，思想越反动。”在王吉道、王智升的眼里，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是“黑线专政”，老干部都是错的，都是坏的，都有问题。只有王吉道来了之后，才有新的朝阳观。这不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猖獗”吗？毛主席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对我们党的干部队伍做了全面的正确地评价，明确指出：“我们党有成百万有经验的干部。我们这些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我们有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而林彪和“四人帮”搞的“打倒一切”，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十七年来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导地位，否定了党的领导，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否定了毛主席关于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的英明论断。他们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罪人。这笔账，我们一定要彻底清算！

二、篡改“五·七”指示，用“下放”劳动惩罚老干部。干部进“五·七”干校，下放劳动，这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干部进“五·七”干校是对的，是完全应该的。但是，王吉道追随其主子毛远新、李伯秋，从根本上背叛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另搞一套，把干部进“五·七”干校，歪曲成是为了“解决干部过剩问题”。王吉道、王智升和“四人帮”一样，是十足的两面派。他们的心目中，明明是“好人不下放，下放没好人”，把“五·七”战士与地富反坏相提并论，在孩子升学、招工等具体问题上，与地富反坏分子同等对待，而在口头上，他们却说下放的干部都是“三好、两高、一无限”的，（即身体好、思想好、工作好，毛泽东思想觉悟高、路线觉悟高、无限忠于毛主席的人）；他们明明是想利用插队，把老干部赶到乡下，企图把他们永远排除于政权机关之外，让“五·七”战士一年发工资，二年搞补差，三年变工分，但在名义上，却给“五·七”战士戴上一顶“插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桂冠，美其名曰“两把扇子一起煽”。并以林彪的“一号”手令，欺骗干部，说你们下去，打起仗来就是“第二革委会，是去建立‘红色根据地’。真是好话说绝，坏事干尽。他们公然违背毛主席的指示，借题发挥，强令“五·七”战士搞“五带”，毛主席明确指出“除老弱病残者外”，他们却把当时属于老弱病残的八十多名机关干部统统列为插队对象，甚至动了大



手术和处于癌症后期的老同志、半身不遂的老红军也都不能幸免。他们还把一些只有三四十岁、身体较差，实在下不去的老弱干部，也逼迫退职，退休，企图把他们一脚踢开。王吉道、王智升的这种做法，不要说是无产阶级感情，简直连起码的人道主义都没有。

三、“二次整党”，大抓所谓的“漏网走资派”。“二次整党”，又叫“整党补课”，是“四人帮”的死党毛远新及其党羽李伯秋等人，背着中央、背着毛主席在辽宁擅自进行的一次阴谋活动，是对广大共产党员、广大干部，特别是革命老干部的一次大镇压。王吉道秉承其主子的旨意，利用栽赃陷害，无限上纲，伪造历史，私改档案，颠倒黑白和搞逼供信等卑劣手段，仅在朝阳地区机关，就抓出所谓“大鬼小鬼”一百三十二个，抓出一批所谓的“漏网走资派”，把他们重新打倒。有一名已经结合进革委会的老干部，因为向王吉道反映，干校占了生产队的地，群众有意见，他们就给这名老同志扣上“不愿去干校，反对走‘五·七’道路”大帽子，又编造“拉拢腐蚀群众”的罪名，然后，把这个老干部作为“漏网走资派”重新打倒。王吉道还别出新裁，又把那些坚持原则，执行党的政策，同意解放老干部的人，扣上“犯了放走走资派”的错误，作为补课重点，大会批，小会斗，“爬坡”、“检讨”，搞得人人自危。王吉道、王智升追随毛远新、李伯秋，搞的这套所谓“二次整党”，“二次党员登记”、以及所谓“路线爬坡”，抓所谓“漏网走资派”，抓所谓“新生走资派”，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这充分说明他们是推行“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的急先锋。

四、利用“吹氧”，对老干部扣帽子，打棍子。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后，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明确指示，要进一步落实干部政策，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亲自做工作，并在中央和地方安排使用了一批老干部。曾和林彪反党集团狼狈为奸的“四人帮”，就恶毒地攻击说，“这是修正主义‘回潮’了，要‘反回潮’”。“四人帮”的死党毛远新及其党羽李伯秋，抛出了中央冶金部高扬文的材料，擅自下发全省，阴险地提出了给老干部“吹氧”的反动措施，猖狂围攻老干部。

王吉道在大小会上多次宣称：“高扬文不是孤立的，是代表一种思潮”，“老家伙都有个正确对待文化革命的问题”。并诬陷一位地委领导，是“检讨的快，认识的快，解决的快”，“思想不一定真解决”。诬蔑另一位老干部“是搞‘唯生产力论’”，“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没解决，等等，首先把矛头对准常委内的老干部。这就为机关的“吹氧”，在全区抓“高扬文式的人物”定了基调。他们把安排使用老干部，诬蔑为请“隐士”，“举逸民”，把对“四人帮”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有意见的人，说成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革命的账”，“是攻击文化大革命”；把那些坚持规章制度，抓经营管理的老干部，说成是“把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的东西又拣回来了”，说成是“穿新鞋走老路”；哪里生产上去了，他们就说哪里领导干部“搞唯生产力论”；谁要触犯他们的一点帮规帮法，就说你九、十次路线问题没解决。一时间，许多老干部，有的被吹病了，有的被吹垮了，有的又靠边站了，有的是有职无权了。最后，在毛远新、李伯秋的指使下，不管体格强弱，又把一大批老干部送进“五·七”干校，集中去解决所谓的“三个正确对待问题”。

挂羊头卖狗肉，用漂亮的外衣掩盖其凶恶的面目是“四人帮”及其党羽的拿手好戏。表面上高喊着用“吹氧”解决领导班子的路线是非，实际上是借“吹氧”打击老干部。这就是王吉道、王智升紧跟毛远新、李伯秋，搞阴谋活动，大耍两面派的丑恶面目。

五、打着“让贤”的旗号，向老干部夺权。“四人帮”在辽宁的党羽和亲信，盗用省委名义，在海城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让贤”的反动口号后，王吉道等人便迫不及待，不遗余力地在朝阳大搞名为“让贤”，实则“夺权”的反革命勾当，乘党委改选之机，把老干部往后排，向外挤，有的让靠边站，不安排工作。致使有的县二分之一的公社书记被降职，被调离。谁要提干部被挤掉不合适，就给谁扣“论资排辈”、“右倾保守”的帽子；谁要说有的青年干部不称职，王吉道就打谁“攻击新生力量”的棍子。王吉道学着“四人帮”的样子，专横跋扈压制不同意见，这种党阀作风，在我党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六、鼓吹阶级关系新变化，大抓“走资派”。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过程中，王吉道上窜下跳，急急忙忙抛出“谈谈我对走资派的认识”，又是发刊物，又是搞录音，到处讲用，现身说法，承认自己是“正在走的走资派”，妄图使“全区广大干部自己承认都是‘走资派’”，然后一举打倒。非但如此，王吉道还制造出一个“大官小官相对论”，叫嚷什么：“‘大官’是相对的，在一个县，县委书记是‘大官’，在一个公社，公社书记是‘大官’，在一个大队，支部书记是‘大官’。”甚至荒唐地强调，“在团支部里，团支部书记也是‘大官’”。为了完善王氏“相对论”，并具体地规定了，农村走资派的标准是什么“三转一拧，石灰捶顶，院内有洋井。”在这种反动谬论的煽动下，一时间，全区便刮起了层层揪走资派的黑风，摸一个单位发现一个“走资派”，摸两个单位揪出二个“走资派”，弄得我们朝阳地区似乎“走资派到处有”，“走资派遍地走”，严重地颠倒了敌我关系，完全否定了共产党的领导。

王吉道还在组织部门宣称：组织部的工作，要适应“四人帮”打击老干部，大抓“走资派”这个“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在辽宁的党羽和亲信，迫害老干部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他们公然策划了公安和组织部长会议，把专政的矛头指向党内，妄图对一大批革命老干部实行法西斯专政，是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全国人民一举粉碎“四人帮”，他们这个反革命企图才未能得逞。

“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理论上荒谬透顶，政治上反动至极。王吉道、王智升推行“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打击老干部，罪责难逃。

## (二)

王吉道、王智升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一方面，是排斥、打击革命老干部；另一方面，就是拉帮结伙，搜罗帮派势力，把他们的亲信安插在重要岗位上。极力拼凑资产阶级帮派体系。

在培养干部的标准上，他们背叛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另搞一套，党同伐异，结帮篡权。



在选拔干部的方针和方法上，他们践踏党的章程，破坏党的优良传统，以帮划线，任人唯亲。不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只看一时一事，只凭一封要官信，一张大字报，一次讲用，甚至就凭窃取别人劳动成果的一块实验田，就可以飞黄腾达，当上县委书记。

在培养干部的途径上，他们违背毛主席关于“要在三大革命斗争中，在群众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培养干部”的教导，“限期提干”，“飞过海提干”，“飞机式提干”，“火箭式提干”，大搞“双突”。他们强令各级班子的一把手，青年干部要占三分之一，青年干部占整个班子的三分之一；主要负责人当中青年干部要占三分之一。不具备这几个条件，不予审批。为拉帮结伙，在组织上给予保证。

在对待犯错误干部的处理上，对革命老干部百般挑剔，无限上纲，一棍子打死；对他们“帮”里的人，却千方百计地掩盖、包庇。

在干部管理上，王吉道、王智升肆意践踏毛主席“党委集体领导”、“党管干部”的原则，大搞“帮”管干部。他们把个人的意见强加在党委之上，独断专行，称王称霸。他们搞了一个帮规帮法：说什么“要害部门的领导干部任免，不经王吉道同意，就不要往常委会上拿。”妄图把共产党的地委变成他们“王氏”的家天下。连提拔一个县委书记，都不经常委集体讨论，只是少数亲信小串连后，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再强加给地委，以朝阳土皇帝的架势，以势压人。

王吉道、王智升在我们地区拉帮结伙，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假借历次政治运动，另搞一套，乘机网罗党羽。王吉道、王智升紧跟“四人帮”，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另搞一套，然后按着他们的标准，选拔所谓“尖子”，提拔重用。从文化大革命到现在，他们都是这样干的。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紧跟“四人帮”及其死党，大搞“吹氧”，然后，就把那些按着他们的调子搞“吹氧”，无情打击老干部的人，破格提拔起来，塞进各级领导班子，安插到要害部门。这种打着革命旗号，咬人作恶，拖人下水，扩充帮派体系的作法，比资产阶级政客拉帮结伙的手段还阴险毒辣。

二、保护坏人和重用有严重问题人，做为他们帮派势力骨干。因为“四人帮”是由无耻叛徒、国民党特务、阶级异己分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结成的反革命黑帮，所以由其反动的阶级本质所决定，他们在搜罗帮派势力时，招降纳叛，网罗党羽。王吉道、王智升也是采取“四人帮”的手法，纵容坏人，包庇有问题的人。

建平县的邹吉祥，是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专搞“打砸抢”，并在当权后，利用职权，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严重违法乱纪的犯罪分子。王吉道、王智升，秉承其主子李伯秋的黑旨意，散布什么“邹吉祥是造反派，有贪污也不算贪污”，“他进不进县委，是对造反派的态度问题”等等。强行拉进县委班子，纵容他在县委内任意横行，长期不作处理。

还有一个干部，历史上有问题，组织上已做过恰当的结论。就是这样一个人，王智升曾多次指令地委组织部给他改结论，准备进一步重用。

王吉道、王智升这样干的罪恶目的十分清楚：就是把一批坏人和有严重问题的人，包庇起来，做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得力骨干，作为“四人帮”上台后，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

三、举办“青年干部学习班”，利用“朝农”，培养“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革命打手。多年来，王吉道、王智升紧紧抓住“朝农”和“青年干部学习班”不放，把“青年干部学习班”和“朝农”当成腐蚀拉拢青年，培养“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打手，搜罗帮派势力的场所。

他们背叛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伙同“四人帮”的亲信，叫嚷要把“朝农”办成“政治大学”，要成为“培养干部的基地”。他们办的所谓“政治大学”，就是把“朝农”办成培养张铁生式的反革命打手的大学，办成训练林立果式的“小舰队”的大学，就是办成同党中央、国务院“对着干”，推行反党政治纲领的大学。所谓把“朝农办成培养干部的基地”，只不过是象他们搞的那个夺权试点一样，打着“社来社去”的旗号，煽动学生回农村，层层夺权，层层揪“走资派”；就是象他们所准备的那样，用所谓的“学宣队”，到地区“农口”各局“参与领导工作”，到省直机关当处长，局长，扬言要“送到国务院，教育部掺砂子”夺无产阶级的权。

王吉道、王智升鼓吹办“青年干部学习班”的宗旨，是培养同走资派作斗争的“战士”，并直接控制和操纵“青干班”，号召全区层层举办“青干班”，对参加“青干班”的同志腐蚀拉拢、封官许愿，对青年干部教唆、挑拨。让青年干部“回去后，不要站在领导集团之中，”以此制造分裂，挑动青年干部打击老干部。

此外，王吉道、王智升还利用年轻人思想单纯，政治上不成熟的弱点，乘虚而入，用修正主义的毒素毒害青年，充当他们篡党夺权的打手。在他们的诱骗下，一些青年被“四人帮”“闹而优则仕”的毒弹打中了，目无组织，目无纪律，横冲乱打，煽动停工停产。王吉道、王智升这样做的险恶用心，就是妄图把大批青年干部拉下水，让青年干部为他们打击老干部，建立帮派体系充当急先锋。他们根本不是关心支持新干部，他们和“四人帮”一样，是腐蚀、坑害青年干部的教唆犯，是摧残新生力量的罪魁祸首。

但是，应该看到，“朝农”的广大革命师生和参加过“青年干部学习班”的绝大多数年轻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现在他们已经积极投身于揭批“四人帮”的战斗之中。王吉道、王智升一伙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

四、颠倒是非，任人唯帮。“四人帮”及其党羽，是一伙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他们有时是形而上学猖獗，否定一切或肯定一切；有时是搞反革命诡辩，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为了安插亲信、结帮篡党，就玩弄诡辩论，把他们的同伙，坏的说成好的，错的说成对的。王吉道、王智升拉帮结伙，也采用这种手段。首先给他们的帮兄弟戴上一顶很漂亮的帽子，然后破格提拔，倍加重用。有的人本来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打砸抢分子，他们却称之为“响当当的造反派”，用政治流氓的伎俩，强迫别人提拔重用；有的人本来是无政府主义者，目无党纪国法，横踢乱咬，他们却硬说这种人“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是“反潮流英雄”，委以重任；有的人本来是伸手要官、要权，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他们却说这是“敢挑重担”，就给官给权，甚至当场表态，立即升



官；有的人只会察颜观色，看风使舵，说假话、说大话，只图虚名，不干实事，他们却说那是“政治上敏感”、“会抓大事”，“上级精神跟的紧”，就破格提拔、委以重任。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有一个干部，目无党纪国法，在破案过程中，大搞逼供信，利用各种酷刑，造成残废、死亡三十多人，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对这样一个坏人，王吉道之流不仅不严肃处理，反而颠倒是非，说那个人是“带着无产阶级感情打人”的。不顾广大群众的强烈抗议，把这个人提拔为县团级领导干部。王吉道之流的倒行逆施，是在用朝阳人民的鲜血，书写自己的罪恶史。这进一步说明，王吉道、王智升，为拉帮结伙不择手段，已堕落到何种地步？！“四人帮”及其党羽，确实干了日本鬼子、蒋介石想干而没有干成的坏事，起到了公开的阶级敌人所起不到的作用。无数事实说明他们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别动队，是祸国殃民的害人虫。我们一定要行动起来，以当年打日本鬼子和打蒋匪帮那样一股革命气势，以控诉黄世仁、南霸天那样一种阶级仇恨，批判“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砸烂“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把“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批得臭不可闻，夺取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彻底胜利。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 彻底批判“四人帮”及其死党的亲信 王吉道、王智升、徐明篡党 夺权的反革命罪行

中共朝阳农学院委员会副书记棋琴

“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在朝阳地委的亲信王吉道、王智升、在朝农的亲信徐明和他的一小伙效忠“四人帮”，疯狂地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肆兜售“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精心地炮制了所谓“朝农经验”同党中央对着干，同国务院对着干，同毛主席革命路线对着干，疯狂反对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反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反对我们英明领袖华主席，诬陷中央领导同志，妄图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把朝农变成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工具，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对此，我们必须加以彻底批判。

### (一)

王吉道、王智升、徐明一小撮紧跟“四人帮”，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敬爱的周总理、英明领袖华主席、叶副主席，诬陷邓副主席及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

四届人大前夕，“四人帮”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背着中央到长沙向毛主席告周总理的状，江青写信伸手要官，他们在上海的余党策划了所谓“丰庆轮”事件，攻击周总理，就在这个时候，死党毛远新伙同黑干将迟群，在朝农召开了臭名昭著的“现场会”，疯狂攻击和否定十七年，攻击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路线，贬低毛主席完全赞成的江西共大，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借华北农大搬迁问题，大反周总理，大骂“因循守旧”，大批“投降派”、“当代的李鸿章”、扣上“最危险敌人”的帽子，叫嚣“要搬掉一座其重无比的大山”，为“四人帮”阴谋组阁大造反革命舆论。死党毛远新杀气腾腾地叫嚷：“我就要拿朝农这块有棱有角的石头打人了！”黑干将迟群气势汹汹地狂叫：“就是要拿朝农这块石头打他们！”王吉道心领神会的向徐明说：“这是中央部门开的会，要把省里想说而不好说的话，通过我们讲出来。”文化大革命中，华北农大由北京搬到陕北，后来从农业大学的合理布局 and 实际需要出发，向国务院请示搬到河北涿县。王吉道在“现场会”期间，参加了部分农林院校座谈会，在会上华北农大党委副书记王明远同志义正词严的申明了，华北农大搬迁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在“现场会”期间，徐明的同伙也曾向农林部崔璇同志询问过华北农大搬迁问题，崔璇同志明确地告诉他：“华北农大搬迁是国务院批准，周总理同意的”。这个同伙立即向徐明一小伙汇报：“崔局长和我讲，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华北农大搬回来是经过国务院批准的，周总理同意的。”并说：“崔局长是好心好意告诉我们这个情况，让我们注意点”。徐明丧心病狂地说：“不管怎么说，华北农大搬回来是有问题的”，“不管谁批的，这笔账都要算”。徐明一小伙更变本加厉的在“搬迁”问题上搬弄是非，继续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一九七五年末，“四人帮”紧锣密鼓加紧了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四人帮”在两校的写作班子发表了《教育革命方向不容篡改》的反党黑文，死党毛远新授意其亲信王吉道、徐明炮制《大事大非问题一定要辩论清楚》一文，同两校南北呼应，大造反革命舆论，肆意歪曲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污蔑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是“回潮”，“复辟倒退”的路线。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级领导干部，统统扣上“哭丧妇”的大帽子，受到反动文痞姚文元和死党毛远新的赏识，亲自修改定稿，亲笔加按，强调要同两校那篇黑文作为“姊妹篇”，“放到一起读”。与此同时，王吉道、徐明，秉承死党毛远新在辽宁的大总管李伯秋的黑旨意，又炮制了“十个对着干”。在周总理逝世才二十天，人们的眼泪还没有擦干的时候，王吉道赤膊上阵，亲自主持广播大会，让徐明向全区推销“十个对着干”的黑货，继续攻击周总理。王吉道叫喊：“朝农的经验是带有方向性，路线性的经验，它不仅适用于教育战线，同样适用于国家机关，适用于各行各业，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这个黑货人民日报以《在批判旧世界中建设新世界》为题



发表。这篇文章再次借华北农大搬迁及“从中学生中招收部分学生进大学”，“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教学”的问题，攻击周总理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公开鼓吹党中央对着干，同毛主席革命路线对着干，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他们反对毛主席和周总理是由来已久的，早在一九七三年死党毛远新大搞反“回潮”的时候，徐明一小伙明明知道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教学是毛主席接见美籍学者李政道、杨振宁时，根据他们的建议，周总理向毛主席作了汇报，主席表示赞同的，还大反转反，当做“回潮”来批。徐明阴险地说：“有机会就搞复辟，搞倒退，总想翻案”。又说“回潮与反回潮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对十七年旧教育绝不能一分为二，对十七年能分出什么来呢？”徐明的同伙说：“旧十七年好像国民党，新五年就像共产党，对十七年一分为二，就是打着红旗，为十七年评功摆好”。他们叫嚣：“要批当代的儒，宰相儒”，“要做少正卯，准备掉脑袋”。

在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以后，全国人民都沉浸在无限悲痛之中，学院广大师生怀着对敬爱的周总理无限怀念的心情，要求开追悼会，徐明说：“不要感情用事，斗争很复杂，有些风就是从他那那里来的。”更不能容忍的是，当有人对他讲斯里兰卡下半旗七天悼念总理时，他狗胆包天地用手敲着报纸说：“资本主义国家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都是有感情的”。把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诬蔑为“民主派”，真是反动透顶！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徐明公然把第三届毕业生给毛主席致敬信中，颂扬周总理，学习周总理的一段话删去，换成向清华、北大战友学习。“四人帮”利用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于当晚八时，将此稿电传北京，二十六日早晨作为新闻节目头条消息向全国播送，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举国上下隆重举行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紀念会。徐明效法大叛徒江青不脱帽，不鞠躬，不颂扬总理的丰功伟绩。当有人严正的提出徐明不脱帽群众有意见时，徐明竟狂妄地说，那有那个规定，中央开会还不脱帽。徐明，中央开会谁没脱帽，就是江青不脱帽，你为什么模仿江青也不脱帽，真是罪该万死。徐明的另一个同伙在建平热水种畜场，也和徐明一样，不主持紀念会，不讲话，不参加颂扬会，不看悼念总理的电影。他们疯狂反对周总理的狼子野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在“四人帮”另搞一套的罪恶活动中，徐明同黑干将迟群、谢静宜和上海的余党加紧反革命勾结，互相频繁派出代表团，进行反革命串连活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份，先于中央打招呼会议三个月以前，“四人帮”在教育部的党羽窜到朝农，把八位副总理在科技汇报会上的插话和周荣鑫同志的一些讲话当做奇谈怪论，提供给徐明一小伙。紧接着在朝农贴出了全地区第一张大字报，第一个喊出开除邓副主席党籍的反革命口号。七六年中央一号文件下达后，徐明同伙中的另一个人恶毒攻击叶副主席说：“是什么病，是思想病，是老右。”并大叫“这就是夺权，军权是关键。”一语道破了“四人帮”妄想篡党夺权的野心。一九七五年末，死党毛远新收集朝农的所谓教材，供他反党之需，徐明推波助澜地说“毛远新正在北京和他们斗呢！一本教材就是一发重型炮弹！”他们还搞了两份大字报，送到教育部，直接参与了诬陷迫害周荣鑫同志

的罪恶活动。

大叛徒江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报告：“说轻点是修正的，重点是修正主义的。”徐明多次狂叫：“全国农业会议上的报告，不讲农业教育，无论如何是不妥的，是错误的。”徐明伙同王吉道，破坏华主席肯定的华容四级科技网的经验，把《朝阳地区四级科技网经验交流会》强令改成《反击右倾翻案风，推广朝农经验现场会》。徐明还责难参加筹备科技网会的同志：“是给谁抬轿子，不给他当那个吹鼓手。”把攻击的矛头直指英明领袖华主席。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后，徐明同伙中的另一个人煽动说：“江青当主席，张春桥当总理我同意，华国锋当主席我不表态”。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之后，徐明恶狠狠地说：“谁继承谁篡改还不一定呢。”“现在掌权的，是否忠于毛主席这都要看一看”，“不让提对着干，中国语言有的是，叫血战到底吗？”徐明的一个同伙说：“江青是主席夫人，能反对主席吗？”“是谁先动手的问题”。徐明一小伙中的另一个人说：“你办事，我放心，还不上是主席给谁提的呢！”“徐明一小伙中的又一个人说：“我看现在是右倾势力上台了。”当有人对徐明的同伙说“‘园丁之歌’在报纸上发表了，这个戏是华国锋同志在湖南亲自扶植的，毛主席看后高兴的鼓了掌，表示赞同。”这个同伙气极败坏地说：“什么园丁之歌不园丁之歌，给我拿一边去，我不感兴趣，我们朝农就是朝农！”看徐明一小伙反动气焰嚣张到何等程度。

粉碎“四人帮”人人喜洋洋，英明领袖华主席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毛主席选定的好接班人，是我们的好领袖、好统帅。徐明一小伙顽固地站在反动立场上，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替“四人帮”扬幡招魂，我们坚决不答应：“四人帮”及其死党的亲信王吉道、王智升、徐明等一小伙反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恶毒攻击敬爱的周总理，英明领袖华主席、叶副主席、攻击诬陷邓副主席及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的罪行铁证如山，罄竹难书，这笔账我们一定要彻底清算！

## (二)

王吉道、王智升、徐明在为“四人帮”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同时，秉承“四人帮”及其死党、党羽和亲信的黑旨意，积极为“四人帮”提供在一个地区、一个公社、一个国营单位、一个学校进行全面夺权的黑经验。

他们大搞“局系结合”、“政校合一”。所谓“局系结合”就是，朝农各系向地委的对口局派学生担任领导，各局局长到对口系任职，局系合并，到朝农办公，接受朝农领导，以校代政，乱党夺权，取而代之。王吉道说：“这件事涉及到国家机关改革，把官僚机构冲一下”，“要冲击到国家机关的现行制度。”

这还不够，王吉道还在推广朝农经验现场会上宣布：“建立四级科教网，朝农是网头，一年开三次县委书记会，行政工作、技术工作要接受朝农领导”。徐明也说：“这是新生事物”，“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改造国家机关，这些老右不整一下不得了。”“四人帮”在教育部的亲信特地来信支持说：“这是个创举，是新生事物，是共产主义



的幼芽，是改造国家机关的一次试验”。死党毛远新在辽宁的大总管大加赞赏地说：“局系结合好”。他们妄图用“局系结合”来破坏党的领导，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把全区纳入朝农体系，纳入“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轨道。

他们为“四人帮”在朝阳县木头城子公社搞篡党夺权的黑样板，徐明叫嚷说：“要搞一个公社、一个大队的典型，让朝农毕业生在一个公社成气候，担任各级领导职务。”他们派回去七名朝农毕业生，先后夺了八个大队和公社党委的领导权。徐明派回去的那个亲信公开叫嚣要“把木头城子公社变成朝农的直属单位。”他们搞乱了木头城子公社。徐明还恬不知耻地说：“都象木头城子公社那样，朝农就在朝阳站住脚了”，王吉道说：“都象木头城子公社，朝阳的问题就好办了。”他们把这个黑样板作为朝农的果，又写文章，又拍电影，又组织参观，向全区、全国推销。

他们把国营热水种畜场变成朝农的热水分院。王吉道利用职权，让徐明的同伙当上国营热水种畜场党委书记。这个同伙从朝农带去两名干部、二十名学生，借加强领导为名，派到全场各级组织，充任朝农的“工作队、宣传队、播种机”，任务是监督各级领导，把热水办成“朝农的缩影”。这个同伙公开号召：“谁敢当大队书记，可以报名，不是党员的现批！”他还明目张胆地涂掉了“农业学大寨”和“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标语，换上了“学朝农、赶朝农、誓叫热水变朝农”的口号，更为荒唐的是提出“种畜场要以育人为主”，“把猪场、羊场也要变成朝农”的口号，疯狂地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着干，使种畜场遭到空前未有的浩劫，一年内亏损五十二万六千元，粮食减产七十多万斤。

他们把原地区农机校划归朝农以后，由于农机系抵制徐明、王吉道的那一套反动路线，他们就大动手术，大抓走资派，把三十一名干部教师打成了十个“混王”，七个“妖精”，四个“神仙”，“三大自在”，“四个向上爬”。十名班子成员只留下一名工宣队员、一名学生代表，其余全部下放基层劳动。

他们还插手外地，亲自接待并派人去河南省南阳地区镇平等县，鼓吹“对着干”，支持大搞打、砸、抢，大抓“走资派”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王书英等一小伙。徐明一小伙人对王书英等讲：“南阳地委书记、镇平县委书记是走资派”，并把矛头指向省委书记刘建勋同志和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同志。说：“他们比国民党还厉害”，“真是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地主资本家办不到的事情，他们办到了。”煽动王书英回去“贴他们的大字报，糊他们的大字块，抓他们的走资派”，使南阳地委无法工作，南阳地区十二个县被搞乱了七个县，地委书记和十一个县委书记无法主持工作。

徐明伙同王吉道等一小伙从基层到地区，从校内到校外，为“四人帮”全面篡党夺权，拿出典型，提供经验，这就是黑干将迟群和王吉道所说的朝农经验“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具有战略性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王吉道徐明一伙人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大搞篡党夺权的铁证！

### (三)

“四人帮”和死党的亲信王吉道、王智升、徐明狼狈为奸，积极推行“四人帮”炮制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恣意篡改党的教育方针。他们按照国民党特务张春桥、黑干将迟群鼓吹的“只办一个专业，就是敢于造走资派反的专业”和死党毛远新提出的“我们朝农培养出来的人，就是敢于造走资派的反，就凭这一条我就批准他们毕业”的反动谬论，大办“政治大学，培养‘长角’‘长刺’敢于同走资派作斗争的先锋战士”，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王吉道说：“我总想把朝农变成自己的干部学校，政治大学，造就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造反派，先锋战士，要让他们分析一个县委，一个公社党委，一个大队党支部，上边也能分析，能斗垮走资派，就是中央也敢反。”徐明说：“我们这里是出人材的，将来要向全区、全省输送干部，送到地区，送到省当处长、局长，送到国务院、教育部掺砂子。”并叫嚷“知识越多越反动”，“劳动就是学习”，“业务到手，人被夺走”，“学了专业，忘了专政。”他还说：“我们朝农首先是政治大学，其次是劳动大学，最后是业务大学，”“果林系、水利系的学生，只要会看山护果，盖房子搭屋，就是大学毕业！”王吉道也说：“农学系的学生，只要会加风杖子，就是大学毕业！”他们拆掉了科学试验室，取消了基础理论课，砍掉了体育课，学生入学三年时间，只上八、九个月的专业课，挥舞着“智育第一”的大棍，使学生深受其害。他们还把“四人帮”所豢养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交白卷的张铁生，多次请到朝农来现身说法，提出以张铁生为榜样，号召全校向张铁生学习，做张铁生式的反潮流英雄。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培养打手。

请看他们培养出来的几个扬名中外的“典型”。

所谓“永不休战的先锋战士”王贵彬，原来是一个做过小买卖，在当村农会主任期间，因贪污公粮、私开烧锅，包庇坏人受到撤职、留党察看处分，他是一个专能说谎吹牛皮的人。由于他到朝农举办的棉花短期训练班学习几个月，自己到处吹嘘朝农、吹嘘自己，编造事迹，招摇撞骗，群众讽刺地称他“王大学”。王贵彬当上大队书记之后，安插亲信，把扎寨营子变成了王家大队。全大队共八个生产队配了七十一名队长，每个队都派了朝农学生当队长。其中二队队长十三人，其中有十名学生。他还把一个“坑、崩、拐、骗”的人拉入党内担任三队队长，把一个好端端的生产队搞垮了，这个队一年内死了耕牛五头，骡马三头。全队六百六十亩地，有四十亩没种，荒芜二十亩，有三百亩只铲一遍，使余粮队变成了缺粮队，劳动日值由六角钱降为二角。他编造的所谓《我为革命上大学，誓叫家乡变大寨》及“三顶资产风”，“四次反击战”，“九评修字号”，“十个对着干”等黑经验，在县、地、沈阳、大连、太原、昔阳直至上海、北京等地大肆放毒，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攻击中央和地方领导同志。他还恬不知耻的在群众中说：“在北京少年宫做报告，人家学生排着队迎接我，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那样。一会我向他们握手，一会又向他们招手”，“有一天我上王府井大街去逛，一看百货大楼前边有老高一个大塑像，我寻思是毛主席呢，走到跟前一看，还是我王大



学的像，看到当时我感动地流泪了，旁边还有个像是徐明的。”他还在群众中散布：让他的四女儿把他的路线带到西藏去，把五女儿送到清华，回来宣传他的路线。到处吹嘘说全国人民都爱戴他王大学，小学生都誓死捍卫他王大学，并狂叫：“我王大学不是扎寨营子的王大学，也不是公社的王大学，也不是县的、省的，是全国的王大学”，“看我这个老头不咋的，可我代表朝农经验，谁反对我王贵彬，就是反对新生事物，就是反对朝阳农学院。”就是这样一个人，死党毛远新说他比教授还强，黑干将迟群说他是名符其实的标准大学生。那个所谓同传统所有制实行决裂的典型，当过小学教师，暂时困难时期退了职，当了逃兵，六九年当了大队副主任，由于搞分裂，挨了批混不下去进了朝农。被徐明视为一员“虎将”说他是张铁生的弟弟，在现场会上，受到死党毛远新，黑干将迟群、党羽刘盛田的赏识，被大树特树起来，其实他的“先进事迹”全是伪造的，他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编造了“半拉碗”的苦难家史，吹嘘自己是拿一辈子工分的新农民，实际在朝农没毕业，就投机当上了挣三十四元的公社农业技术员，是个工资迷，捏造顶了“四定一奖”，把自己打扮成反潮流英雄，就是这样一个人徐明一伙还是要推荐到省科技局当处长。

那个伸手要官的典型，当上大队书记后，王吉道又封她为“地区工作队长”王吉道、王智升亲自为她当“顾问”，徐明为她保镖，她狐假虎威，为非作歹，横冲直撞，“扒大院套”、“炮轰祖坟”、“破产还债”、“赶大集”，大搞夺权，保护坏人，被死党毛远新称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模范”，实际上是三路进财，挣着大队高工分，拿着朝农的补助费，不到二年时间贪占公款二百四十元，粮票一百二十九斤，给木头城子公社的革命和生产造成严重的破坏。

那个决裂旧观念的典型，在朝农毕业后，窜回大队当上副主任，狂叫：“踢开党委闹革命”，拉帮结伙，大搞分裂，和公社党委，大队党支部“对着干”他一年不干几天活，经常在社员家吃吃喝喝，也被吹成“坚持三同的好干部”公社农业站解决育种田花期不遇的方法，被他窃为己有。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这些人都顽固地站在反动立场上，为“四人帮”鸣冤叫屈，恶毒攻击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反动气焰十分嚣张。这就是“四人帮”和死党毛远新的亲信王吉道、王智升、徐明和他的一小伙所培养出来的“先锋战士”。

王吉道、王智升、徐明是地地道道的“四人帮”的亲信，朝农是货真价实的“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工具。徐明供认不讳地说：“朝农是通天的”，“上边有两个中央，我是自觉跟江青的”，“三次给江青写效忠信，江青给朝农送学生、送苹果。王吉道、王智升、徐明一小伙说：毛远新、江青是我们的后台。徐明野心膨胀地说：“人家都把我们比作延安了，人心党员之心都响往朝农”，并把现行反革命分子张铁生高呼朝农万岁的信用红纸书写公开贴出。徐明还厚颜无耻地说：“大学党委书记当个中央副部长也不算提拔。”他的同伙欣喜若狂地说：“徐明当了中央部长，咱们也肋臑不了哇！”一语道破了他们卖身投靠“四人帮”的真面目。“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不计血本通过“拍电影”、“写小说”、“编戏剧”、“写文章”、“写诗歌”、“出画册”大肆兜售朝农经验，其反革命气焰一时甚嚣尘上。但是历史是无情的，今天王吉道、王智

升、徐明和他的一小伙连同他们的主子一起受到了人民的审判。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我们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伟大战略部署，抓住“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打好第三个战役，深揭狠批“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教育战线上的具体表现，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夺取教育战线抓纲治校、大治快上的新胜利！

## 篡党夺权的一个铁证

### ——揭发批判王吉道、王智升、徐明的反党罪行

中共朝阳区木头城子公社委员会副书记邹吉信

王张江姚“四人帮”，炮制了“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都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妄图打倒一大批党政军的负责干部，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四人帮”在朝农的那个亲信徐明和辽宁死党、党羽在朝阳地委的亲信王吉道及王智升等，为了邀功请赏，总结“实践经验”，在我公社亲自搞了一场篡党夺权的大演习。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 一、奉行反动纲领，打击迫害老干部

“四人帮”死党毛远新、迟群，精心炮制的朝农经验里用心险恶地提出：“朝农首先办成政治大学。”“我们朝农培养出来的人，就是敢于造走资派反，就凭这一条，我就批准他毕业。”死党迟群叫嚷“大学只有一个专业，就是斗走资派的专业。”

“心有灵犀一点通。”王吉道、王智升、徐明等心领神会，提出培养“敢于向走资派挑战的新式农民。”要学生作“敢于同走资派作斗争的坚强战士。”为使这一谬论付诸于实践，“四人帮”那个亲信徐明，窜到木头城子公社，指示那个伸手要官和唯权是夺的那两个典型，“要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成为“敢于同走资派作斗争的先锋战士”。

“揪走资派要先走一步”“迅速地拿出人证物证来。”

他们这伙，奉着徐明的旨意，按照死党毛远新、党羽李伯秋、亲信宗明兰等的理论，以王吉道关于资产阶级在党内，走资派还在走的讲话为根据，炮制了木头城子公社“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的标准。农村党内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是：“四间房、灰锤顶，三转一拧（即自行车、缝纫机、挂钟、收音机），院内有个压水井”；政治标准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核心是搞“唯生产力论”；资本是“手中的权力”；年龄是“四十五岁”以上。按照标准，通过办大学，举办理论讨论会、搞展览等形式，大肆叫卖这套



黑货。说什么“木头城子大队八十多名大小干部中七十多个有经济问题，这就证明资产阶级在党内已经形成了一个阶层”；集体所有制已变成走资派的所有制。”供销社有一名职工安排二个亲属，就是“权力变成资本”的铁证。热心抓生产的干部就是“猫”书记，猫主任、猫队长”，公社搞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是“唯生产力论的大演习”；公社党委安排老干部工作，是“举逸民”“民主派热爱民主派。”在这片喧嚣声中，他们首先集结在西营子大队科教基点，搞一个抓党内资产阶级的“联营联防”，并草拟了“声明”，规定了“章程”，并委托同伙分别调查材料，做好抓走资派的组织准备。接着就集体去外地学习斗走资派的经验，回来后开始行动。根据调查材料，集会研究，认定走资派。给公社党委成员画像：“×××、×××是党内的资产阶级”“×××是唯生产力论的典型代表”。“×××是老右倾、民主派”，“×××是宋江”。

为抓几个“党内的资产阶级”“找几个走资派”，于一九七六年五月的一天夜晚，动用民兵组成小分队，突然袭击，搞了个“家家户户挖走资派，箱箱柜柜翻走资派，窟窿洞里掏走资派”的非法大搜查。全公社共搜了六个大队，一百零七户。重点是公社党委成员，社直社办党支部书记。公社石绵矿党支部书记董占祥这一天夜里，一伙人闯入家，箱箱柜柜全部打开，行李包裹件件查看，窟窿洞里全都掏遍。连罐头瓶里装点零碎东西，掖在箱空里的小孩裤衩，也仔细地检查一番。吓的他家的孩子直个劲地叫妈，董占祥的母亲八十多岁了吓得直哆嗦。翻了三个来小时，雄鸡报晓，方才离去。这番暴力措施，并未获得战果，只好把三个一般职工作为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用来抓党内的资产阶级。他们强令公社党委研究“阶级关系的新变化”，通过这三个“典型”，承认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承认自己是走资派还在走。这一举动，得到了王吉道的赞赏。并把这里“一穷、一富”的典型，作为他出卖灵魂的一篇题为《谈谈我对走资派还在走认识》的黑文里的一个例证，以此说明“权力变成资本”，给“按劳分配”栽赃。并把那个唯权是夺的典型请到地区举办的理论讨论会上作《坚持乡村，作与走资派斗争的先锋战士》的发言，为“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作注脚。

在“四人帮”死党、党羽、亲信叫嚣“揪走资派”、“抓一层人”猖獗之时，我公社对老干部也大打出手，采取了各种手段，整掉了一批老干部。

一是横加罪名，坚决整掉。诬蔑老干部是“背着笨篱为了捞油水上来的”，甚至谩骂为“坑、朋、拐、骗、偷、奸、懒、馋、滑、坏”。“蛤蟆肚子、蚂蚱腿，苍蝇鼻子，蚊子嘴”。还随便地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什么“党内走资派”“老资产阶级分子”“老右倾”“民主派”“宋江”等，信手拿来，随意乱扣。西营子大队现任党支部书记徐世英同志，被称之为“一馋二懒三迷糊”。是“典型的民主派”，“为老资产阶级效劳”等，强令到各队检查交待，予以整掉。西三家大队现任党支部副书记邵振英被扣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扎向贫下中农心里的软刀子”等帽子，又加上了九条罪状，予以整掉。使这位为党工作三十来年的老干部，伤心地抱头痛哭了一场。原公社党委书记侯化文同志，李玉同志，也分别以“老右倾”“民主派”“唯生产力论的典型代表”等罪名，撵出了木头城子公社。

二是算损失账，硬给你拿掉。对拿不掉的老干部，就以你干了这么多年，生产你搞

不上去，这个损失你赔得起吗？使你被迫让位于他人。

三是加派青年，架空挤掉。对于威信高、拿掉贫下中农通不过的，就在你前边加派个青年一把手。使你欲罢不忍，欲干不能，左右为难。名曰让贤带班，实际上是挤掉。公社党委委员、副主任王化龙同志，是位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被那个伸手要官和唯权是夺的典型，视为“老资产阶级分子”，留在党委内，只管养猪，不把他整走，而是作为斗争对象，反面教员，作为他们向上爬的踏脚石，使之不能翻身。

四是以需要为名，变相撵跑。我公社有位老干部，在不到二年的时间里，从大队撵到五七中学，从中学又撵到林果分校，从分校撵到西营子大队，不到二年就五易其位。使之有职难尽，有权难掌。

在近二年来，对我公社老干部动了二次大手术，撵走公社党委书记二名，撤换大队党支部书记十二名，大队副主任以上干部二十五名。生产队正副队长，撤掉的更是骇人听闻。有个大队一下子就撤换了十六名队长。那个唯权是夺的典型，掌权的那个大队，组成小分队，专背地里搜集老干部的情报，一下子就整掉老队长八名。一时闹得全社广大干部人人自危，个个惶惶不安。王吉道、徐明等一伙，一意孤行妄图打倒一大批革命的老干部，其目的就是要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清除“障碍”。

## 二、另立帮标准，妄图建立新天朝

王吉道、徐明为把木头城子变成朝农的一个“缩影”，成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前哨阵地”“桥头堡”。肆意篡改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践踏党的组织路线，背离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另立标准，建立朝农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罪恶活动，篡党夺权。

1、另立标准，大搞“双突”。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我公社西营子大队在朝农读书的一个学生，在朝农“高教现场会”上，当着“四人帮”死党毛远新、迟群，党羽刘盛田，及他们的两个亲信王吉道，徐明的面，告了西营子大队党支部的阴状，并伸手要官，回乡当党支部书记。毛远新当即批准，予以封官加冕，并捧腰打气地说：“别怕，你就斗”。刘盛田连声赞扬“好！有勇气！”。迟群吹捧为：“这是朝农教育的结果。”王吉道也乘机献媚，慌忙表态，连声支持。徐明更是忘乎所以，欣喜若狂。但野心未足，并还抱怨说：“你们真熊，怎么不报名当公社书记去。”于十二月下旬，由王吉道、王智升等保镖，近百人护送，这个伸手要官的典型，回乡上位。时隔不久，毛远新又从沈阳来长途电话，要这个伸手要官的典型，去哈尔套取经练道。在哈尔套，毛远新赠笔记本，党羽李伯秋赠铅笔。在朝农现行反革命分子张铁生，又与其合影留念，提词鼓励。从此，徐明，王吉道就在我公社，竭力煽动向伸手要官的典型学习，“培养和发展这样式的人物”吹捧为“全国的典型，抛向全世界的一块石头”“通京的干部”。并别有用心地指令公社党委：“农村都靠民主派行吗？”“要选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六亲不认的小青年”。原党委那个人，依样画葫芦，提出了对各级班子动大手术，决不能心慈手软，姑息留恋，要选准“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看样有没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人，入党提干，充实各级领导班子。对各级班子人选，年令大的不要，没有文化的不要，



要，老好人不要，民主派不要，没有培养前途的不要。并把这套黑货作为组织路线，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在我公社“双突”中，也手段齐全，花样新鲜。

一是先封官，后入党。有的还不是党员就封为书记，委员，副主任。然后再入党。有的当书记已半月，才入党。

二是点名入党，强令提干。有个只因慌报“炮轰祖坟”有功，就被王智升点名入党。说什么：“这样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几次上报，党委都没批准。而那个唯权是夺的典型上台后，不经党委讨论，就宣布为党员，提为支部委员。有个几经说服，强迫该人入了党，提为大队二把手。但现在还仍说：“上当了”“我想退党，不找那个麻烦。”

三是“八一批，提一帮”。一九七五年春有二个大队的支部成员，全被撤换，新选的成员一个党员没有。所以一下子九名新成员全部“突击入党”“突击提干”。成为两个“双突”的班子。近二年来，我社提拔副主任以上干部近五十名，其中“双突”的四十四名。由于“双突”，使党组织和干部队伍造成了严重不纯。

## 2、“社来官去”，建立朝农体系。

徐明、王吉道为使朝农“站住脚”“成气候”形成“一股势力”，把木头城子公社变成朝农的天下，于一九七五年始到秋末，派出了以朝农副主任那个唯权是夺的典型带队，七人组成的小分队，来到木头城子公社。一下子“卡吃”掉五个大队书记，夺了五个大队的权。徐又密令五·七中学的那个人，也往大队派了四名干部，夺了两个大队的领导权。我公社十五个大队，有八个大队的领导权控制在三校毕业生手中。一九七六年三月，徐明又指示那个唯权是夺的典型：“让其身兼四职，即朝农副主任、公社党委副书记，木头城子大队党支部书记，西营子大队科教基点长。这个点长，要一统在木头城子的三校毕业生。”（即朝农、县五·七大学、公社五·七中学。）从此，那个唯权是夺的典型，就以点长的身份，控制着八个大队的领导权。

徐明一看时机已到，良时莫误。七月又窜到木头城子公社，授意于那个典型“公社应有你们的代言人，着眼点应放在公社。把木头城子改变过来才是你的本事。”那个典型立即写信给王吉道，告了公社党委的阴状，并伸手要官，到公社当党委书记。得到了王的同意，并派人面授机宜。那个典型爬上了公社党委书记，又拉进自己的同伙作为助手。对党委要改组，采取两步走的策略，第一步挤走一把手，第二步拿掉其它成员，拉入他的同伙任秘书、组织、副主任等职。由于“四人帮”的垮台，第二步才未得逞。为使朝农的“香烟不断”，按徐明的旨意，那个典型又选派了七名青年送朝农学习，准备回来接班。“要形成一股势力”扩大朝农体系。对生产队的领导权，通过办大学班、举办理论骨干班，五·七中学、政治夜校等四条渠道，选拔人材取而代之。这个典型在掌权的大队，组织了三十多名小青年，亲自讲课，重点栽培。选拔了二十一人任队长、会计、保管，当教师、上大学等等。他的同伙，也积极效仿。

为彻底成为朝农全面夺权的公社，徐明又嘱托那个典型：“朝农要把三年级的学生都分到你公社的各个大小队，可以让他们参加大小队的领导班子。你当总管。好的要留下，算朝农助你一臂之力，在这里比本事。”那个典型听此欣喜若狂，但徐明的美梦，

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成为一枕黄粱。

3、“社校一体”以校代政。徐明、王吉道，精心炮制的“政校一体”“局系结合”的黑货，也在我公社推行试验。妄图以校乱政，以校乱党，以校代政，以校代党。

一九七六年春，我公社在徐明的授意下，以五七中学为骨干，搞了个“厂、站、校对口合并”，“队校合一”、“社校合一”“政校一体”的五七大学。这个大学强行合并了我公社的农机管理站，拖拉机站、农业技术指导站、水电站，畜牧兽医站，文化站，教育组及医院等十一个社直社办单位。把这些单位的书记、站长、主任，统统调任五七大学，在大学总支的领导下。犹嫌不足，又把公社的文化、教育、秘书、组织、等干部，拉到大学分别任科教组副组长、教员及各种班的负责人。公社一位组织委员，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四变其位，什么政工组组长，办公室主任，大学的副主任，理论班的负责人等。使党委的人事大权，也控制在大学里。真可谓“一切权力归五七大学”，架空党委的领导。

以重视教育为名，又随意下了一道命令，凡是学校负责人是党员者任副书记，不是党员者任副主任。男教师任生产队长，女教师任妇女队长。一时全社大小官员成堆，大小头目成行。更有甚者，还有那么几个人，还提请公社党委挂“五·七大学”的牌子，名正言顺地搞一个“木头城子公社校办政府”。

这着棋，博得了“四人帮”死党马天水代表团的喝彩，在他们《学习与批判》的帮刊上，予以热烈歌颂。“四人帮”死党的亲信温巨敏，赞不绝口，并要请那个人去省讲，要全省推广。

这场篡党夺权大演习，由于徐明、王吉道的坐阵指挥，使之“成功”。徐明高兴得手舞足蹈，说什么：“都象木头城子公社那样，朝农就站住脚了”、“现在已经看到希望了。但是还不够。以后我再招生象木头城子那样，一个大队一个公社的招，毕业回去有股势力，能站住脚。变一个大队一个公社容易”。王吉道说：“都要象木头城子那样，一个一个地配套成龙”。廖廖数语、其目的已暴露无遗，就是要篡党夺权、妄图建立他们的“新天朝”。

## 三、打击迫害贫下中农，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四人帮”在朝农那个亲信徐明，辽宁死党、党羽在朝阳地委那个亲信王吉道及王智升等人，在这场篡党夺权的大演习中，卖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我社作为试验场。使我公社成了全区有名的“灾中之灾”。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受到了严重干扰破坏，广大贫下中农，革命群众蒙受了一场大灾难。

王吉道、王智升、徐明等人依靠他们树立的伸手要官，唯权是夺那两个典型，伙同五七中学和原党委内的那个人，歪曲、篡改列宁、毛主席关于小生产的理论。以“改造小产生”为名，打击迫害贫下中农、革命群众，倒转专政矛头，颠倒敌我关系，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众所周知，一九七五年一月份，王吉道、王智升等人，学着毛远新的腔调，按照毛远新的样子，照葫芦画瓢，在我社搞了一场所谓的“大批资本主义的闹



剧”他们不顾群众的死活，对欠三角债的社员，不问具体情况，搞“破产还债”。偿还不起，就动用民兵小分队或学生组成的战斗组，闯入民宅，抬箱抬柜，赶羊抓猪等抵债。木头城子大队社员林树春因家中人口多，病人长年用药，欠了集体的口粮款。就抬走了他家仅有的二口缸，一口柜，弄得全家痛哭了一场。他们不顾群众利益，强奸民意，“扒大院套”“炮轰坟”“赶大集”，搞得民怨沸腾。以“限制自留地搞商品生产”为名，在社员的自留地上一次又一次的扫荡。“拔黄烟，刨韭菜，割线麻！”“以搞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为名，搞“小靳庄”“讨论会”“搞办大学”等名堂，任意增加群众负担。木头城子大队，平均每个劳动力负担非生产工分一千零七十，每口人负担三百来分。非生产用工分占总工分的百分之三十还强。严重的破坏了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挫伤了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对此群众稍有不满意，就办班、罚款、打骂、游斗。木头城子大队一下子就办过四十多人的学习班，并由民兵轮流执勤看守。被办班人员家属一天三餐送饭，不准求见。对这些人，横加训斥、打骂。以“打击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为名，随意捆绑，打骂群众。扎兰营子大队近几年对群众办班，打骂，罚款，批斗好几十人。对办班人员，还收取办班费。有个民兵排长，因反对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的人当队长，就被打得遍体鳞伤，致使该人精神失常。这样的大队却被誉为“先进”“模范”。有个大队，只因社员参加大会战来迟了一会，就让来迟的社员在工地上，自己敲锣打鼓游斗几圈。仅十几天的工夫，就游斗群众十几个人。那个伸手要官的典型，还怂恿一个队长说：“不老实（指群众）你就收拾他。”这个队长仅几个月，就打了六名社员。有个社员，只因去盘锦给儿子盖房子，就以“盲流”定罪，送大队办班二十天，罚款四十元，扣粮一百斤，全大队批斗。无钱付罚款，就搞走了他家的一口柜。一个共产党员，因担任现金保管，差款三十元，就武断地定为贪污，送大队强行办班。其母在家死去，仍不让回家。后经众人担保，由民兵押送回家处理丧事，事毕带回。有三个共产党员，只因未参加王吉道、王智升等人搞的大批资本主义万人现场会。抓住点他们的错误，就组织千人大会批斗，游街示众，然后由王吉道宣部开除党籍。

对阶级敌人却不批不斗，听之任之，甚至予以保护。历史反革命分子苏和卿，一九七五年一月回乡，被送到专业队的小房里，用集体的小米养了六十来天，最后送走。那个唯权是夺的典型，当大队书记向他汇报四类分子应该批斗时，他说：“那是明牌的，眼睛要盯在干部身上，抓小生产，抓暴发户。”他们的一意孤行，颠倒了敌我关系，镇压了群众，迫害了贫下中农，是可忍孰不可忍。

为要驱使群众，迫害贫下中农，永世不让群众翻身，还采取“愚民政策”摧残劳动人民的子女，毁坏教育。他们以“四级办学”为名，把我公社校舍扒掉、卖掉一百多间，桌凳损失七百多套。使学生只好去生产队的饲养处，“前边拉磨，后边上课。”教学质量极度下降。南营子中学，房舍被扒掉、卖掉三十多间，桌凳损坏三百多套，教学仪器，图书搞个净光，损失达五万余元。他们还提出什么“劳动就是学习”“会榜地、栽树、剪枝”就是“最好的质量，最高的水平。”所以他们提出了“三课一讲两活动”。不要教师，不要教材，不要学校，不要课堂，不要理论。使学生长期参加集体劳动，学校成了“劳动力的调配所”。那个唯权是夺的典型，清晨起来，就进了广播室，

拿起麦克风一喊，“那个班去那个队薅草”那个班去铲地”，就算完毕。他们这样干，确实毁灭了教育，耽误了一代人。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对于王吉道、徐明、王智升等所炮制的木头城子公社那几个典型，木头城子的“经验”，进行大推销，大拍卖。中央省市地二十多个新闻单位，纷纷来人采访拍照，著书立说，好几个文艺团体，前来拍电影，编节目，各地演出，可谓喧嚣一时。近二年来，全国二十九个省市（台湾省除外），中央各部（国防、外交除外），二万多人来木头城子参观，可谓谬种流传，害人不浅。公社四位书记搞接待，招待费花掉二万多元。使我社的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去年十月，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使我们免遭了二茬罪，免受了二遍苦。我们决心学习好，宣传好，贯彻落实好党的十一大会议精神，掌握武器，联系实际，坚决打好第三个战役。把与“四人帮”搞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彻底查清；把“四人帮”党羽，亲信在我公社犯下的罪行，彻底清算；把他们散布的反革命黑货，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批深批透。不获全胜，决不收兵。